

湖州古代商业起源探析^{*}

周向阳

(湖州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我国商业起源只始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然而,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资料表明,人类历史发源地之一的湖州,在洪荒之时即已孕育商业之胚胎,并最终产生了商业。这有力地说明,江南商业与中原商业一样,发展甚早。

关键词:湖州; 商业起源; 考古发掘材料; 古文献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388(2012)02-0083-04

Analysis of Commercial Origin of Huzhou

ZHOU Xiang-ya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formed a notion that commercial origins of China bega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owever,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ancient literature show that Huzhou,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mankind history originated, began to have the embryo of commerce at the time of primeval society, and eventually produced commerce. All these proves that the commercial origin of Jiangnan began as early as tha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 Huzhou; the commercial origi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cient documents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我国商业起源只始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至于江南地区的商业在中国商业史中的地位 and 作用,则少有人注意。但实际上,江南商业的发展并不晚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掘材料和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来看,作为中国人类历史发源地之一的浙江湖州地区,商业发展非常早。本文拟就此展开探究。

一、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个别的、偶然的物物交换的出现

湖州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之一,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 10 万多年前,古人类就已经在西苕溪流域这块土地上生活栖息。虽然,“邃古之民,生活鄙陋,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食草之食,衣禽兽之皮,不独经商服贾,茫然不知,树艺稼穡,亦非所习”,^{[1](P5)}但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生产力发展,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原始手工业相继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特别是农业,成为史前湖州地区主要的经济形态。有关研究表明,此时期,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的沼泽地带,已开始人工种植水稻。^[2]在处于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邱城崧泽遗址中层,发现了一件崧泽文化时期较小的三角形犁型器。^[3]这表明,当时湖州的农业已经从耜耕阶段发展到犁耕阶段了。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同时,原始手工业也产生并得到发展。在处于母系氏族时期的邱城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如石镞、石斧。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釜、鼎、陶罐等。此外,还有骨器,如狩猎用的骨镞、切割或钻孔用的骨锥,及缝缀用的骨针等。遗址中还出

* 收稿日期:2011-11-18

作者简介:周向阳(1974—),男,湖南长沙人,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

土了三块炭化的野生葛麻织成的织物残片,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织物,表明当时的手工艺已比较先进。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手工业水平进一步提高,崧泽遗址的墓葬证明了这点。该遗址发现了9座墓葬。在随葬品中,发现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型,如纺织工具石质、陶瓷质纺轮,石、骨质针等物。^{[4](P5)}可见,母系氏族时期,人们的生活比原始人群时提高了很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交换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由于各地区氏族、部落之间具有不同的经济特点和文化面貌,再加上“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的暂时分工”,^[2]使得交换成为必要。原始的物物交换就在这时产生了。

在湖州古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湖州先民们进行物物交换的一些痕迹。如邱城遗址的下层出土了大量的作为装饰品的玉器,安吉县递铺镇安乐村的安乐遗址中层崧泽文化层中,累计出土各类遗物数百件,其中有一些玉质佩饰。^{[5](P5)}然而,湖州本地是不产玉的,在浙江境内,只有青田、昌化等处产玉。其他产玉地离浙江较近的有山东邹县、峰县和莱阳等地。^[2]很明显,这些玉不是湖州所产,而是异乡之物。这些玉可能是通过物物交换从附近部落或遥远的氏族部落辗转得到的。

当然,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分工也不太明显,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成为专门性的生产部门,只是在农闲间隙中才进行一定的手工业生产。因此,这种交换只能是个别的、偶然性的。而且,限于当时有限的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基本上还是实行氏族公有,劳动还不是私人劳动,产品也还不是私人所有。虽然当时可能存在某种私有现象,但私有制尚未形成。所以,那个时期的物物交换只在氏族、部落之间进行,氏族成员之间基本上不可能产生交换。

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商品交换的扩大与商品生产的开始

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浙江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湖州属于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是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东林乡良渚文化遗址。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和生活水平较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大大提高,湖州已经进入初级文明社会。^{[6](P12)}考古学家慎微之先生曾指出:古时之钱山漾,“其大部分为古城市之旧址”,“曾一度人烟稠密,嗣因洪水泛滥,古吾陆沉,始成今日一片汪洋”。^{[4](P4)}

良渚文化时期,湖州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开始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分工态势,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商业生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 农耕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良渚文化时期,湖州耕作农业持续发展,水稻种植技术大大提高。在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成堆的稻谷。据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粳稻是籼稻经过长期栽培派生的品种,由此也反映出湖州水稻种植悠久的历史。同时,湖州先民已经懂得人工灌溉和施肥技术,遗址出土了专门用来辟水和罨河泥的“干筴”。在稻作农业之外,蔬菜瓜豆的种植和果树的栽培已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蚕豆、芝麻、花生、甜瓜子、西瓜子、两角菱、葫芦等多种栽培作物的种子,酸枣和毛桃等水果类种子,及一些尚未辨识和鉴定出的植物种子等,就是很好的证据。

从湖州良渚文化遗址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1)湖州原始农业发展较早,且技术较为先进。良渚文化时期,湖州农业生产已经进入犁耕农业时期,并步入犁耕农业的成熟阶段,正在向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2)湖州原始农业内涵丰富,品种多样,除了稻作之外,还有众多的瓜果蔬菜。这些农作物与稻作种植相辅相成,保障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湖州的原始农业相当发达,且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2. 畜牧业的发展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的饲养也发展起来。钱山漾遗址中,存在着大量的猪、狗、牛等骨骼,说明湖州先民已经饲养家猪、狗和牛等。

3. 手工业的发展与分离 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为湖州先民提供了比以前丰富的物质资料,也为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提供了条件。良渚文化时期,湖州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到了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1)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数量众多,种类多样。仅就竹器而言,在钱山漾文化遗址已发掘的7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200多件竹器,且品种较多,有农业和日常生活用的鱼篓、谷箩、竹篮、簸箕以及竹席等。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纺织工具陶制纺轮57件,还出土了许多诸如斧、钺、刀、镰、钻、凿、矛、犁等石器。^{[4](P5)}(2)手工业的技术水平较高。钱山漾文化遗址中的手工艺品竹制品,绝大多数是用刮光篾制成的。其编织方法多种多样,有些编制部位与现在的“杭州篮”相一致,尤其是使用了“梅花眼”和“辫子口”等较复杂的花式。^{[4](P3-4)}这必须具备相当熟练的技术水平。其中发现的一只1.8米长的木船桨,制作规则,削制光洁,说明此时木器的制造有了较高技艺。陶器,美观实用,胎质细腻,胎壁匀薄,已掌握并盛行快轮制陶术。此外,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细丝带、残绢片和丝线等,其中出土的绢片采用平纹织法,其技术

同现代一般的丝织品相近,反映了湖州先民在丝、麻织品的纺织技术上已获得巨大的成就。^{[4](P5)}东林乡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了斧、琮、钺、璧、环、冠等制作精致的玉器。从这些玉器可以看出,在制玉行业,人们已经掌握了切割、磨制、抛光、雕镂等工艺。

上述手工业品的生产不可能是农闲才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所能完成的,只有专业手工业者,才能生产出这些数量多、技术高、样式精美的器物。湖州古遗址中的玉器也反映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1971年,湖州杨家埠良渚遗址出土了一件长条形玉钺。该玉钺近肩部有一大一小的圆孔,两面各有若干道平行的阴线弦纹,并相交接成有规则的几何纹。有关专家认为,玉钺是礼器,是兵权的象征。由此可知,当时湖州已经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6](P6)}1986年,在东林乡的一个良渚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斧、琮、钺、璧、环、冠等制作精致的玉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千金商墓村泾堂墩遗址也出土了玉璧、玉环、玉锥等良渚玉器。^{[5](P8)}湖州古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但数量多,品种丰富,有礼器、祭祀用器和装饰品三大类,而且这些玉器的琢磨、雕刻都很精致,布局、花纹、表现手法各异,应当是专业人士制作。生产大量如此技艺精湛、高度规格化、社会化、标志化的玉器,从玉材的选择、储运、研制、转运、交换、使用,没有专业化的琢玉劳动储备和严密的社会分工,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据此认为,“在这些多工序、高技能的专业化劳动中,折射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趋势。”^[7]所以,可以断定,良渚文化时期,湖州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及相互分工,使剩余产品出现,私有财产也随之产生;同时,也使商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和必要。马克思在论述商业的起源时曾经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8](P159)}因此,父系氏族公社时,在出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情况下,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农牧产品、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的交换,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上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但正如前所述,湖州本地区是不产玉的,玉器或玉器原料只能依靠外地供应。可以肯定,如此大规模的需求,通过个别的、偶然的物物交换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换发生频繁,且已经比较正规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交换的扩大,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也出现了。这在钱山漾遗址下层出土文物中反映出来。考古人员在该遗址的甲区发现了两处居住遗址:一处是呈长方形的房屋,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面积约为4.75平方米。房屋的正中有一根“檩脊”,上面盖有大幅的竹席。在该遗址下层出土了200多件竹器和植物种子等。乙区的一座房屋,长约3.18米,屋顶盖有大幅树皮、芦苇和竹席等。在它的东边散乱地堆放着许多青木冈木,木材旁还发现了多处红烧土灶穴。这两座房屋呈南北向排列,相距约40米(中间尚有未发掘部分)。^[9]“甲区的房子里和屋旁有大量的竹器,不大可能都是自己使用的。把它看作交换的商品,似乎比较恰当些。”^{[10](P322)}这样的分析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随着湖州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剩余产品越来越多,私有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较频繁、较大规模的正式的商品交换已经成为必需。母系氏族时期那种个别的、不经常的交换形式,逐渐被正规的、经常的、社会所必需的交换,即商品交换所代替。随之,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

三、传说时期湖州商业的产生

到尧、舜、禹、防风氏传说时期,湖州社会经济大为发展,衣食居处较之洪荒之世,已截然不同。而且,为政者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推动着全国商业的发展。如黄帝时,政权一统,并采取措施,使“通商之途广,物产之转运易。”^{[1](P6)}尧舜之时,商业上虽无大设施,但“其庶政之与商业有关者实多”,如“后稷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又使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即分工之制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即贸迁有元也;以风化未通,九州隔绝,命奚仲挠曲为了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即便利交通也。”以上种种,虽非专为商业,“然有裨于商业者甚大。”^{[1](P10)}大禹平息水患,自是有利于交通和商业。同时,禹本人也十分重视商品交换的作用。据《尚书·皋陶谟》记载,禹在治理洪水之时曾说:“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丞民乃料,万邦作义。”意为大水得治之后,要和稷一起教民播种百谷,使人们有充足的粮食和肉食;要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这样,天下才得以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虽然,这些并不是具体针对湖州商业的有力措施,但也能成为湖州商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湖州商业产生了,并有一定的发展水平。

1. 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 商品交换不仅在部落内部进行,也在部落边界间进行,甚至可能已达更远的地方。据《管子·揆度》篇说:尧舜的时候,“北用禹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这说明黄河流域的部落和西

北、长江流域之间的部落已有交换。上海青浦福泉山9号墓出土了一根罕见的象牙雕刻,这可能是从南方通过交换得来的。^{[11](P11)}这些虽然不是关于湖州商品交换的直接记载,但可作为当时湖州境内先民们商品交换产生的印证,说明交换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临近的部落氏族之间,远距离的商品交换已经产生。这种远距离的商品交换自然也不再可能是原来那种直接的物物交换了。

2. 商品交易的种类丰富、数量加增 此时,商品交换不再局限于此前的装饰品玉器、粮食、家畜、陶器、竹器、麻布、丝织品等都被投到交换中去。而且,数量加增,远非此前所能比拟。这从禹时各州所贡之物大体可见。大禹平息水患之后,乃分别九州^①,任土作贡。《尚书·禹贡》记载: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簞、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

3. 主要商品的发展情况 湖州丝绸历史悠久,技术水平高,成为当时重要的商品。虽然对湖州丝绸商品的交换尚无直接史料记载,但《禹贡》的相关记载可作旁证。扬州上贡贡品中有“织贝”,乃“绵名,织为贝文,诗曰贝锦。”虽然,现尚不明确扬州所贡“织贝”是否出自湖州,但湖州早在钱山漾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平纹绸,所以,到禹时出现“贝锦”这种高档丝织品应是可能的。而且,当时湖州丝织发达还有一个佐证:湖州属古防风国。传说中防风氏也是个治水英雄,而且是百越民族的创世神。大禹治水成功后在会稽庆功,《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帛,丝织品的总称,与会者都要“执玉帛”以贡禹王,这与《禹贡》写的相符。防风氏当时所执之帛应是“织贝”了。另外,《禹贡》载:“扬州……厥篚织贝”,宋人蔡沈注曰:“织贝之精者,则入篚焉。”丝织入篚的事,湖州早有渊源。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绢片、丝带、丝线等物,在被发现时大部分都是存放在竹筐里。^{[4](P11)}因此,《禹贡》中扬州所贡之织贝,极有可能产自或部分产自湖州。

竹或竹器是湖州传统的商品,钱山漾遗址中发掘出200多件各式各样的竹器,而且湖州竹器早已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到此时期,竹或竹器的交换应更加频繁。《禹贡》记载:九州中有六州进贡丝绸,在所贡丝绸之前都有“厥篚”二字。篚就是竹筐。蔡沈注释,“古者币帛之属,则盛之以筐篚而贡焉。”竹主要产于江南,因此扬州“厥贡筱簞”。北方几州所用之篚,其产品或原料应主要来自扬州。而以产量和水平来说,湖州竹器和竹器编织应该已经通过商品交换到了其他六州或其中的某些州。

此外,这时已经出现了较为固定的通商道路,“盖入贡之道,即通商之道也。”^{[1](P11)}

综上所述,湖州商业跟中国商业一样“发达甚早”,且商业之发达,与文化相表里,^{[1](P3)}洪荒之域,即已孕育商业之胚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湖州就存在偶然的物物交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剧,私有制开始产生,交换逐渐扩大并成为经常的、正规的现象,而这又促进了湖州商品生产的出现。到传说时代,湖州商业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范围日益扩大,丝织品和竹器成为主要的商品。随着商品交易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以贡道为主的、固定的通商之路。可以说,在中原地区商业产生的同时,湖州商业也同步发生。这说明,以往我国商业只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说法过于片面。

参考文献:

- [1] 陈 灿. 中国商业史[M]. 王孝通增订.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 [2] 王心喜. 从出土文物看浙江的原始农业[J].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3,(4).
- [3] 梅福根. 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J]. 考古,1959,(9).
- [4] 嵇发根. 丝绸之府湖州与丝绸文化[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
- [5] 沈 慧. 湖州古代史稿[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 [6] 林正秋. 陶水木,徐海松. 浙江地方史[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7] 牟永抗. 良渚玉器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J]. 杭州考古,1994(1/2 合刊).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9] 浙江省文管会. 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60,(2).
- [10] 林耀华. 原始社会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1] 朱国栋,王国章. 上海商业史[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① 九州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扬州地域约包括现在的安徽、浙江、江苏南境、江西北境。湖州属扬州。